

用故事礼赞初心：大人物的小细节

“两弹一星”题材的创作，对我而言，是生命的燃烧，是民族魂的崇高礼赞。

这些年我前前后后花了20年的时间，创作了电影《横空出世》、《钱学森》和电视剧《国家命运》等剧本。在创作中，我始终处于深深的感动之中。我为祖国能够拥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体而感到自豪，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、不屈的脊梁。这是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的故事、是中国人才有的故事，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作家必须去书写的故事、去歌唱的初心。

创作电影《钱学森》时，钱老已经去世了。王淦昌、邓稼先、彭桓武等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重要科学家我都无缘见到，但采访中到处都是他们的故事。钱学森，中国的导弹之父，每次重要试验他都要亲自去发射场，短则三五日，长则三四

个月。有一个测控站离敦煌只有20多公里，钱老多次去那里，却与敦煌“咫尺天涯”。钱老的夫人蒋英对我说，这是钱老生前最大的遗憾。我还从许多人那里听到过同一个故事，第一颗原子弹进行震动试验时，没有专用设备，只好把1:1的化爆弹放在卡车上开到挖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进行颠簸，王淦昌就蹲在化爆弹的旁边进行测量，浑身上下被磕得青一块紫一块，那时他已是年近60岁的老人了。

在核研究院，我听到了邓稼先看电影的故事。那时，邓稼先常常和一帮年轻人晚上在屋里加班，外面放着电影，都想去看又都没时间，先生就发明了“科学制度”：先让一个学生去看开头，第二个去了第一个回来，一共用6个人接力看完一场电影，然后每个人把自己

看到的讲给大家听。还有彭桓武的故事。因为没有设备，彭桓武跑到偌大一个废品站翻找，被人当成小偷送到派出所。1959年，周总理请彭桓武等科学家到中南海谈工作，发现彭桓武总是缩着脚，很别扭地坐在那儿，谈到高兴时，一不小心把脚伸了出来，周总理这才发现他的一双布鞋已经破得像两条鲢鱼嘴，脚趾头全露在外面。彭桓武只好向总理“坦白”，说吃不饱，脑子也不好使了，一狠心就拿着买鞋的钱到馆子里吃了一顿红烧肉……

在罗布泊，一个老兵给我讲，搞第一颗原子弹时几万官兵喝的都是咸水，他们浇筑的所有混凝土“喝”的都是淡水；另一个老兵领着我去看一片老榆树，他说刚去时没有工具，他们把树枝砍了，粗的做扁担、做锹把，细的编箩筐。生活困

难时，他们把树叶、树皮都扒下来吃了。生活好转后，团长领着他们去跟榆树鞠躬道歉，宣布纪律，无论树是活着还是死了，任何人都不准再动它们。一位终身未嫁的“核大姐”对我说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一天夜里，突然来了一股西伯利亚寒流，大雨倾盆，官兵们拆下帐篷、脱下棉衣、拿出棉被，小心翼翼地盖在设备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她看到的是穿着单衣或光着膀子的官兵们。

是的，这一个个感人的故事，如同一支支燃烧的火炬，引领我们走进“两弹一星”那段在共和国历史上镌刻着“永恒”的光辉岁月，它让13亿中国人民的聚合之力更加磅礴，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呕心沥血、舍生忘死的不变初心一路走向未来、走向永远！

《求是》2016年第16期文/陈怀国



林语堂在英文版的《中国报刊与舆论史》一书中，将学贯中西的清末报人王韬推崇为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”。

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报纸——《循环日报》。此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较长、影响极大的报纸之一，是我国近代第一家提出变法自强的报纸；它以“强中以攘外，诹远以师长，变法以自强”为宗旨，要为振兴中华、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

谁是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”？

先进的科学文化；这也是一张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。

虽然王韬的名气没有后来的革命者那样大，但通过办报和翻译，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近代思想的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。

1849年，考举人不第的苏州秀才王韬接受了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聘请，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，协助麦都思翻译《圣经》。1867年王韬到欧洲游历时，已经39岁。此行不仅于他本人意义重大，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也影响深远。

这个意义上，王韬可能是近代史上第一个“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，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”。

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大印象，除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，就是欧洲人民生活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。不过，真正让王韬神往的还是英国。因为就是这个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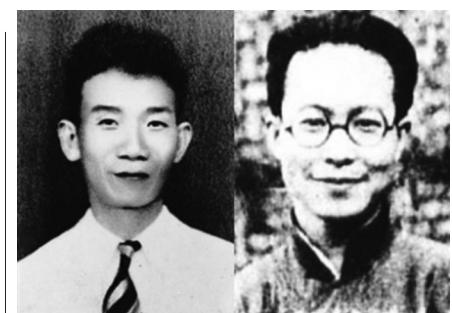
家对中国发动战争，开辟通商口岸，使得王韬这样一个科举失意者在通商口岸找到了立足之地。

哪知来到伦敦之后，王韬发现他竟然成为这座现代城市里的“怪物”。他在英国的出现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当时的英国人都是短装打扮，男士们西装革履。而王韬呢，则是身穿长衫，脑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辫子。当他听到伦敦市民说他是“中国女士”和“詹五妻子”时，只是哈哈一笑说：“余本一雄奇男子，今遇不识者，竟欲雌之矣”。

明明是豪气干云的好男儿，如今却成为托足异域的巾帼雌伏，这正是1868年王韬在欧洲参观的内心写照。在这个孤独的写照下，映射的是王韬作为晚清帝国时期一个文化双面人的悲剧。王韬的一生，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一生。

扬子晚报网 2016.11.10文/杨之



郁达夫与沈从文

两个文人的美谈

郁达夫与沈从文的关系，不同于一般的朋友，近于亲人。没有郁达夫，沈从文可能会客死他乡；少了沈从文，郁达夫可能会沉沦一生。他们的友谊，是“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”的美谈。

郁风在《三叔达夫》一文中记载了郁达夫与沈从文的第一次交往，那是沈从文不止一次对郁风讲过的。

1923年的冬天，沈从文住在北京的湖南会馆里，没有棉衣，没有火炉，就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。他写出来投稿，没有一家刊物肯登。

穷困潦倒的沈从文，在濒临绝境的时候，尝试着给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。当时的郁达夫也正在苦闷之中。接到沈从文的求助信，他不相信，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困苦的人，他发出了一声苦笑，带着看个究竟的心理，他决定去看望沈从文。

那一天，下着大雪，正当沈从文坐在桌旁冷得发抖的时候，推门进来一个人。那人自己报名，啊，竟是郁达夫！看到沈从文在冰冷的屋子里发抖，郁达夫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就把身上的毛围巾摘下，拍掉雪花披在沈从文身上。

沈从文说起这事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，但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1924年初，郁达夫写的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》就是说的沈从文。

1925年，沈从文因投稿，经郁达夫介绍，与徐志摩相识，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，为沈从文走上文学坦途奠定了重要基础。这，沈从文也是没有忘怀的。1936年，当出版一本《从文小说习作选》时，他在“代序”中有这样一段充满感激之情的话：

“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，需要出版者的勇气，同时还有几个人，特别值得记忆，我也想向你们提提：徐志摩先生，胡适之先生，林宰平先生，郁达夫先生……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，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，不会存在。”

《海南日报》2016.11.7文/古藤客

吓不怕、压不垮、打不倒的大胡子

菲德尔·卡斯特罗成就了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，并以一己之力与美国对抗了半个世纪。如今，拉美雄鹰远去，而他的一生，已然成就一段传奇。

让时光倒回到上世纪30年代——卡斯特罗兄弟还在父亲的庄园里追逐嬉戏。小时候，菲德尔将劳尔称为“小跳蚤”。因为，与身材高大的菲德尔相比，小他5岁的劳尔身材矮小。菲德尔喜欢把“小跳蚤”扛在肩头，或者高高抛起，种植园里充满了兄弟俩清脆的笑声。

在13岁那年，菲德尔结结实实地挨了父亲一顿鞭子。原因是，他将庄园里饱受虐待的雇工组织起来罢工，而反对的对象正是自己的父亲。

长大后，菲德尔被称为“吓不怕、压不垮、打不倒”的大胡子，而殊不知，当他还是个没有胡子的清秀少年时就有股倔劲儿。如果打球或打架输给别人，他

绝不会罢休。上学的时候，菲德尔将同学们组织起来，抗议伙食待遇不平等，并因此被开除了学籍。

上世纪50年代的古巴，笼罩在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当中。获得哈瓦那大学法律博士学位的菲德尔很快成为反政府的知名人物，劳尔则加入了早期的共产党。成年后，菲德尔和劳尔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他们不仅是兄弟，更成了战友。兄弟俩一起闹革命、蹲监狱、流亡、打游击。美国《时代周刊》曾经评价说：菲德尔是古巴革命的心脏和灵魂，劳尔则是革命的拳头。

菲德尔是个自信而坚定的领导人。他在古巴推行社会主义制度，使这个加勒比岛国如同一根钢针，深深扎在美国的“后院”。他将土地收归国有，包括自己家的土地，为此母亲一辈子没有原谅他。他是11任美国总统的心腹大患，多



菲德尔·卡斯特罗(左)与胡安·贝拉斯科·卡斯蒂略

少人欲除他而后快。菲德尔一生逃过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638次暗杀行动。杀手们在靴子里放毒药、在雪茄里装炸弹、训练美女特工……而他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我逃过了无数次刺杀阴谋，假如这是奥运会项目的话，我肯定能夺得金牌。”

《北京晚报》2016.11.28

杨沧白和“愤青”邹容的交往

杨沧白是著名的中国民主革命家、政治家，辛亥革命先驱者之一，其孙杨同武曾讲述过一段关于杨沧白与邹容的轶事。

杨沧白是在重庆经学书院跟随吕翼文老师读书期间，认识小他5岁的同乡兼同窗邹容的。

邹容堪称一名“愤青”。他常常不把老师、同学放在眼里，却唯独与杨沧白惺惺相惜，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和见识。他爱到杨沧白家去玩，杨家的人都

知道他的脾气和个性，吃饭时他一定要坐上席的。

邹容脾气火爆是出了名的。有一次，他在街头指名点姓谩骂清政府一名官员，官员命兵卒前往捉拿。杨沧白听到消息，立刻奔到街头拉着邹容就跑，一直跑到观音岩的一所庙里，两人躲了整整一天一夜，待风声平息了才回家吃饭休息。后来邹容出川，杨沧白还写过一首《重庆观音岩诗》追忆此事。

杨沧白和邹容朝夕相处。1900年，两人还相约入了“重庆译学会”，跟英国传教士巴克学习英文。邹容痛恨清政府的黑暗，曾以悲愤的心情写下长诗《革命歌》给杨沧白看，内有“仗义群兴革命军，报仇雪恨逐胡人”等诗句，杨沧白读后深受感动，在诗页上写下了“此歌日须读十遍，读一月后，每饭不忘排满革命之事矣！”

后来，邹容赴日留学，杨沧白亲自送邹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木船，两人相互叮嘱，依依惜别。

人民政协网 2016.11.17文/凌云